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K2506
1030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2版页 161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

统一书号：11072·159

定 价：0.95元

目 录

- 抗战时期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邢公碗 (1)
- 冯文潜教授的一生…………… 黄扶先 (26)
- 回忆国民党灵甫号驱逐舰官兵起义…………… 谢飞鹏 (59)
- 天津解放战役第一八四师被歼记实…………… 刘国举 (71)
- 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在天津被歼经过…………… 饶启尧 (78)
- 天津战役第三三三师被歼记…………… 宋海潮 (84)
- 解放前天津市民食配售始末…………… 孔令朋 (91)
- 天津“八·二〇”事件的前前后后…………… 韩振生(110)
- 徐世昌当国琐事…………… 徐霏霖(122)
- 张勋策动丁巳复辟失败经过…………… 商公泽(142)
- 我所知道的王怀庆…………… 赵世贤(163)
- 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张鹏程(179)

天津机器制革业及华北制革厂……………周乃庚等(188)
天兴制铁所——天津第一家轧钢厂……………张国凤(197)
亚光电器工厂概述……………黄兆友(200)

津门旧闻琐记……………刘嘉猷(204)

八善堂与杜笑山……………金大扬(217)

天津的混混儿琐闻……………朱寿钧(221)

补 白	长芦税警队起义经过……………董化鸢(77)
	“俞再麟事件”真相……………沈嘉元(109)
	天津高等特刑庭小记……………靳麟(121)
	徐世昌也是戊戌变法的破坏人……………涂培藩(141)
	北洋硝皮公司……………苏麒麟(196)
	袁世凯修建天津北站的由来……………孙新源(220)

抗战时期南开大学 边疆人文研究室

邢公畹

四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奉令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于昆明。这个时候，南开大学文学院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并且出版了刊物——《边疆人文》。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复员天津，时地变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及其刊物《边疆人文》的出版，仍继续了一个短暂时期，便告结束。回忆一九四二年八月这个研究室创办的时候，我应南开大学之邀，离开了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四川南溪的李庄前往昆明，参加研究室的工作。四十年过去了，当时创办这个研究室和热情支持这一科研事业的冯文潜、陶云逵、罗常培、闻一多、袁家骅和游国恩诸前辈，都已谢世多年；当时最年轻的研究人员，也都两鬓如霜了。我也已经是古稀之年，对于研究室的创办及其开展科研活动的情况，虽还有所记忆，但也已经近乎一鳞半爪。那么，趁现在留下的一点印象，记录下来，也还不是完全无益的事情吧！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建

抗日战争进行到四十年代初期，除去西北、西南以外，大半个中国的土地都已经沦陷。西南边陲的滇缅、滇越铁路成为

连接国际的交通要道，云南省政府决定再修筑一条铁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边的佛海，以连接滇越铁路。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意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参考与应用。南开大学取得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信托，有了一笔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辟科研阵地。

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之前，都有各自的科研机构：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都办的很有些名气。同时，各校都有一批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专家、教授，组成了一支支科研队伍。抗战期间，三校虽合并，而各校都极力保留了原有的机构。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多数人仍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科研事业，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得以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发扬。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之前，在昆明，文科方面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所——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诞生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我认为，在叙述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经过的时候，这是很值得一提的往事：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于昆明之初，由于一时找不到房子，理工学院设在昆明，文法学院分散在锡都个旧附近的蒙自。后来因为政府的空军要占用蒙自，文法学院才迁入昆明，但也是分散在西城几个中学的旧校舍里。当时的情况是，反动当局倒行逆施，致使战争局势不断恶化；侵略者对我大后方实行所谓的“疲劳轰炸”，昆明不断遭受敌机的空袭；加之通货膨胀，物

价飞涨。但是，尽管有来自政治的、战争的、生活的种种重压与折磨，许多专家、教授仍然朝夕系念着教学与科研，一旦有机会就执着地为之奋斗。四十年代初，迟迟动工、修建又很缓慢的联大新校舍，终于建成于昆明小西门外。文、法学院系集中到新校舍，师生稍得安定，教学逐步正常化。在文学院的中文系里，即由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倡议建立文科研究所。当时，中文系集中了不少专家、学者，教书之外，都还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为人民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建议提出之后，联大教务方面的负责人，原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表示同意，并且在昆明东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司家营找到几间房子，添置了一批图书资料，就办起了一个文科研究所，挂出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牌子，实行人事、教学、科研统一的办法，由闻一多教授负责中国文学部，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教授、专家都参加进来，互相切磋问难，开展了有关的学术研究活动。尽管政府当局早已把教育、科学研究置之度外，而文科研究所这个新机构的诞生，对大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建立之后不久，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开始筹建。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虽然实行联合办校，但各校原有体制仍被保留，在敦聘人员、举办科研等方面，各校仍然可以按照旧章安排，以保存各校教学、科研的传统及其人事力量。所以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的时候，人员大都来自联大的有关院系：研究室的创办人黄钰生（子坚），既是原南开大学的秘书长，又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冯文潜（柳漪）既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陶云逵则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我虽然是由南开大学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约的，但是，西南联大同样给我

颁发了聘书。我除去担任研究室的任务之外，也在中文系任教，由西南联大给我薪津、住房等。虽然西南联大对于开展科研工作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是，科研与教学并重这种默契，确乎给予了三校开展科研的方便条件。我想：如果当时南开大学研究人员没有联大的人事工薪关系，单靠石佛铁路筹委会提供的区区调查费，南开大学还是难以创办一个研究室的。研究室的创办，反映了“南开人”为南开创业的雄心。

研究室的全称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抗战前的南开大学虽然已经建立了文学院，但实际上却连个中文系也没有办起来，只有外文、历史、哲学三系。即使这三系，阵容也很单薄，除了外文系先后由陈遼、柳无忌、司徒月兰担任过系主任之外，历史与哲学两系系主任一直由冯先生兼任。直到抗战爆发，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的文学院也是科、系不全的，拟议中的文科研究所并未能建立。尽管这样，老“南开人”黄钰生、冯文潜等先生却从没有放弃办好文学院、创办文科研究所的雄心。他们不懈地努力，希望在抗战胜利之日，南开大学复员到天津的时候，带回一个健全的、教学科研阵容充实的文学院，并且将计划中的文科研究所付诸实现。因此，也可以说，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办，也负有为未来的文科研究所建基铺路的使命。

我于一九四二年八月抵达昆明。边疆人文研究室正在草创中，黄子坚，冯柳猗和陶云逵三位先生把利用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调查费创办研究室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而后强调说“抗战时期，一切从简”。说到“从简”，这个研究室实在是简陋得难以想象。说是研究室，顾名思义，总该有间房子吧，可是，有其名而无其“室”，当然也就无须什么桌椅板凳之类

的设备。至于图书资料，联大有个图书馆，好歹也能借到一些。联大的教职员工住房都很困难，学校说要盖房，但迟迟未能动土。陶云逵先生因为在昆明找不到房子（或者也可以说是租不起房子），把妻儿安置在昆明邻县呈贡，每周坐滇越线火车到昆明上班、上课。名教授如陈寅恪、罗常培、郑天挺、郑昕、游国恩……等，都挤在靛花巷的单身宿舍里。名为单身教授宿舍，象袁家骅教授夫妇也一直住在那所谓的单身宿舍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论著名的老年专家、教授，或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大都能想到战争年月，不能效命疆场，而能有这样一个远离硝烟烽火的环境，怎能不尽其分内之所能，在学术上做点贡献呢？所以大家都能甘于艰苦。在研究室的同人中，除了陶先生之外，我年岁最大，二十八岁，而且已经结了婚，不得不以工资的三分之一为代价，在翠湖北路租赁了一间狭长的小楼房，并且借得一副木铺板，三条板凳。除两条用以架床，尚有一条可作坐位。尤为难得的是房东太太有一只无门、无底、无屉的破平头柜，扔在出租的房间里，我这个房客正好利用它当了书桌：双脚伸进柜子里，便可伏在柜头看书、写字，做我的研究工作。我的这些条件比起住集体宿舍几个人挤在一间房的诸君，还略优越一些。同人议事，切磋学问，常在我的小楼房里，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冯文潜（柳漪）先生的文林街的住所。柳漪先生身为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兼代系主任，可是靠他的工薪收入，不足以维持一家五口的温饱，夫人黄扶先女士有家馆可教就教家馆，没有就接点刺绣活，一针一线地挣点钱贴补家用，实在困难的时候就把衣物送进拍卖行，以济燃眉之急。

冯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攻习哲学、美学，是一位造

诣很深的专家，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古道热肠，肝胆照人。他对南开大学有极深厚的感情，事业心非常强烈。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不担任职务，而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务。与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打交道的是他，与联大有关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就是研究室用的笔墨纸张，也都是他去采购。为了节省开支，他还常“以步当车”，不辞劳累，为开展科研创造条件。奔忙了足有一年，终于在西南联大小西门外新校舍附近，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找到了一个地址，还借到了旧桌椅板凳之类的应用家具，使研究室名副其实地有了一个“室”。这里本来是一个三合院的旧庵堂，一间正厅，东西两厢。正厅和西厢房是历史系雷海宗先生所建立的历史研究所；东厢房共三间，便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室雅何须大”。研究室不大，但也谈不到什么“雅”，只是由于柳诒先生的努力，小室修葺得门窗户扉俱全，能遮风雨，比起门窗脱落、泥巴墙穿洞的新校舍，似乎还强一筹。更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间小室里，冯先生以零买整存的办法储存下可以“令”计的新闻纸和土造白纸。昆明的物资供应很差，纸张等经常脱销，数以令计的纸张，可算是一笔了不起的“财产”了！

回忆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建，我以为值得一提的是组成这个研究室科研队伍的几乎全都是中、青年人，全研究室人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南开大学当局，特别是创办研究室的黄子坚、冯柳诒两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器重和信赖，敢于使用。当然这些来自大学或研究院、所的青年人业务也是相当过硬的。象陶云逵教授的得意高足——黎国彬攻习社会学、经济地理和人类学，而且英文、法文都学得很好，从事社会调查也取得显著成绩。研究室人数不多，除了陶云逵、黎国彬和我以

外，后来又经罗常培先生推荐来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高华年。此外，还有黎宗猷、赖才溢等。这五、六个人组成精干队伍，迅速地把社会调查、科研活动开展起来。

研究室的调查队伍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兄弟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关于社会、经济、民俗、地理方面的调查主要由陶云逵先生与黎国彬、黎宗猷负责；语言方面的调查由我与高华年担负。调查成果的一部分是为石佛铁路提供所需的资料，主要的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其中有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还有陶云逵、黎宗猷的《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以及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鲁魁山傣族的巫术》等等。^①

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生的时候，即决心从事语言学的田野工作，进行一些专语的研究。参加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之后，一方面任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并不失良机地从罗常培先生学习汉语音韵学、汉藏系语言调查等课程；一方面从研究室获得语言学田野作业的机会。先后到云南罗平县调查布依语，到新平县磨沙地区调查傣雅语，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后来成名的高华年教授的专著《彝语语法研究》，黎国彬教授的专著《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材料就得自当年的社

^① 夷族在解放后称为彝族。

会调查。

二、绝版了的刊物《边疆人文》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刊物《边疆人文》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的双月刊。甲种专刊先后出了三集，第一集是我的《远羊寨仲歌记音》^①，第二集、三集是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的研究》。乙种综合性期刊出了三卷，共十六期，出到第三卷三、四期合刊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南开大学复员天津，最后一期刊物编定于昆明，复员天津之后才出版。

在四十年前旧中国的战时环境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府摧残文化，在他们控制下，反动的、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可以随意出版，而有学术价值的书却难于出版，尤其象语言学等人文科学之类的学术著作，更难得印行。出版商当然也不愿做这类费力不赚钱的买卖。没有刊物，不能出书，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因此，研究室决定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刻蜡版油印。同时大家也觉得这样做比大张旗鼓地搞出版发行更为合宜。因为，我们都很年轻，研究室又是草创的新机构，出点油印书刊，在内部交流一下，取得有关人士、有关方面的指教，或许比其它方式出版发行，更适合我们的身份。冯文潜先生为人、治学也一贯是十分谦虚谨慎的，他自己从不轻易发表著述，但是别人的，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研究成果，他总是设法让它出版。大家在这种风格的熏陶下，都积极地投入了油印刊物的活动。记得综合性双

^① 仲家即布依族，主要分布于贵州各县。

月刊第一期文稿编定之后,就是由陶云逵先生和我刻写的蜡版。为这个刊物,我刻写蜡版不下数千张,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必须打夜作,可是房东太太收一元一月的电费,每晚供电只供到十点钟;十点以后,我若是不关灯,她就拉下电闸,我就只好点起小菜油灯来刻。虽然油烟熏得人头昏眼花,但一想到刊物能很快出版,心里也就觉得热乎了。蜡版刻好之后,油印、装订,则在研究室的“陋室”里进行。包括冯先生、陶先生在内,全室人员只要没有讲课的任务都积极参加。裁纸、调墨、推印刷机的滚筒等等,都是自己动手。事隔四十年,柳猗先生、云逵先生都已作古,《边疆人文》也已成绝版。每展旧卷,则故人往事,萦绕脑际,不胜忆念!

《边疆人文》原来只是想刊发研究室同人的撰述,如社会调查报告、论文、割记等等。虽然也刊登了“欢迎外稿”的启事,但是,我们想到研究室刚刚草创,没有声望,而且油印的刊物,又发付不起分文稿酬,很难吸引外稿。但是,事出意外,《边疆人文》一经出刊,虽只在少数同行和有关单位、师友中传阅,却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前辈老教授们的重视和兴趣,他们不仅阅读刊物,提出意见,而且热心地为刊物撰稿。《边疆人文》期刊的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陶云逵先生写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第二篇是我的《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①一卷二期,仍然只有两篇文章,而且作者还是陶云逵先生和我。到一卷第三、四期,情况发生变化,篇目增多了,内容也丰富了,有了名家的论文。从第一卷第三期开始,先后刊载了

^① 在国际习惯上“台语”(Tai language)这个名称用来指泰语、老挝语、西双版纳语、傣语、土语、壮语等。

著名语言学家、人文学家、著名教授和有关学者的来稿，其中堪称名篇的有罗常培教授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袁家骅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游国恩教授的《释蛮》，向达教授的《瞰青阁识小录》（读樊绰《蛮书》杂记），还有罗庸教授读了我的《释六义之比》之后写的《书释六义之比》等等。除此之外，当时年轻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者马学良（现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民族文艺研究所所长）的《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高华年的《青苗婚嫁丧之礼俗》，张清常的《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方国瑜的《孟孝琚碑跋》，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陈志良的《广西瑶民三百六十皇书》等，都是内容丰富、很有分量的论文。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教授的《说鱼》，刊载在第二卷三、四期合刊上，这成为我们永远难忘的纪念。

油印的《边疆人文》有幸成为同行和有关的学者、专家共同耕耘的园地，其成果与影响都扩大了，所出书刊的篇目、内容，曾被引用，传播较广。

闻一多教授的《说鱼》刊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过了不到一年光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一多先生为争取民主而遭反动派杀害。但先生《说鱼》一文所启示的从“文化人类学”来分析中国古代文献和各族民歌的道路，则始终是治学的楷模之一。回忆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那些年，特别是与先生同住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的几年，朝夕相遇，印象很深。那时候，物价飞涨，衣服破了，鞋子烂了，买不起新的；吃的是糙米饭，菜里不见油水。营养不良是教书人通常的境遇，而一多先生家里人口众多，生活更为艰难。本来他还在一个中学兼课，后来，中学当局怪罪他“讲民主，把学生教坏了”，因而

辞退了他。幸而他有一手刻图章的手艺，在昆明市挂出了“闻一多治印”的牌子。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七号长方形宿舍里，临窗用四块长木板拼起来搭成的“书案”，很象裁缝师傅成衣的工作台。先生和子女们读书、写字、各占一段地盘，他治印也在这台子上。所以台子上除了书籍、纸、笔、墨、砚之外，还有许多印章和治印的工具。那时，先生如果每日能够刻印一方，平均起来可以挣得半个教授的收入。生活虽然困窘，但是治学教书，从不懈怠。先生日常总是穿着布长袍，飘着长髯，提着一枝玉屏竹手杖，端庄而又有几分潇洒的神态，至今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栩栩如生。当时，一多先生在联大中文系开设古代文学课，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诗歌、舞蹈、戏剧的起源和发展，逐渐地对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发生了兴趣。他根据神话、古文字的知识以及“文化人类学”上的一些理论，探讨我国史前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撰写论证古代神话、传说的文章，对于人民大众所熟知的龙凤和龟麟所象征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由于对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对南开大学创造边疆人文研究室一事，非常关心。日常见面，他总要就社会调查的内容、方法问长问短，极力主张出版刊物。先生与研究室主任陶云逵教授成为过从甚密的知交。当《边疆人文》向他约稿时，他欣然应允。

闻先生治学严肃认真，研究的成果不愿轻易发表，很多著作都是反复修改后出版的。一部《楚辞校补》花了十几年的功夫，《说鱼》一文在先生心中酝酿的时间也很长。因为，早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先生的论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上，文中就已提出了“鱼”是古人用以代替“匹偶”的隐语。他完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

析》以后，又搜集有关资料，继续研究。当战争逼使他随清华、北大和南开迁徙入滇的时候，本来他可以乘车、坐船，可是，他参加了部分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达昆明。一路上见到了苗、瑶、彝、傣等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听到了广布于辽阔西南土地上的民歌、民谣和传说、神话。千里旅途的见闻和采风活动，更丰富了他对古典文学、神话、诗歌研究的内容。十年后的四十年代撰写《说鱼》一文时的思路，跟这一段经历是有关系的。

《说鱼》以“鱼”为例，研究“隐语”在诗歌民谣中的应用，并且指出它在社会学中的消极与积极的功能以及流行的时间与地域。从来进行诗歌研究，不外经学的、史学的、文学的三种方法，而一多先生《说鱼》却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我是《说鱼》最早的读者，读完之后，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受益与体会写成《读一多先生〈说鱼〉书后》一文，发表在同一期《边疆人文》上。那时我很年轻，很幼稚，不自知其谩陋，对先生文章中关于《易》之象即《诗》之兴皆隐语，而六义之比则为喻的提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先生并不以为冒昧，反而恳切地支持、鼓励我的研究工作。抗战结束，我便匆匆离滇，与先生握别，回到故乡，却不料这一别竟成千古！回想起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用他的爱国诗篇——《红烛》与《死水》教育了我；当我在西南联大工作的时候，他热情洋溢地在治学方法上教育了我；在对人民的敌人作坚决斗争这方面，他用自己的生命教育了我。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莘田）先生是我的业师。他对于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出版《边疆人文》这个刊物热情赞助，从人事上给予种种的帮助，从业务上给予多方面的指导，

并且亲自为刊物撰稿。《边疆人文》刚出了两期，他就给我们写来了《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他用了缅甸、茶山、纳西、彝、阿卡、窝泥等谱系材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特别重要的是许多西洋的汉学家和泰国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唐代在云南建立的南诏国是傣族建立的。罗先生根据杨慎所辑的《南诏野史》所引《白古记》上南诏先世系有父子连名制的表现，而车里宣尉司的傣族宗谱则无此表现，有力地证明了那些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罗先生研究学术问题，总是先掌握丰富的实际调查材料和文献材料，然后从中去寻找规律，孜孜不倦地进行探求。他教育后辈也常说：写文章必须“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他撰写《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之前的一九四三年，曾到云南西部的鸡足山，在一座名叫悉檀寺的庙宇里，发现了一部丽江木土司的《木氏宦谱图家世系考》的书。回昆明后，整理所得资料，经与陶云逵教授商讨并参考了董作宾、凌纯声等文化人类专家的说法，撰写了《论鸡足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已经提到“父子连名”的问题。文章发表后，先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继续搜集材料，进行研究，写了这篇论文，并曾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西南联大所举行的文史演讲会上宣读。后来又连续撰写了《再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和《三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再论”发表于《边政公论》三卷九期，“三论”发表于《边疆人文》二卷一、二期合刊本。在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出版前，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先生业已病逝，所以罗先生《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发表时还有一个副标题：《敬以此文哀悼陶云逵先生》。文末还有一段按语：